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国探索与国际启示

——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2024 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文静 颜廷武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而提出的重要战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乡村振兴也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三农”工作重点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转移。202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阐明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要求和主攻方向，标志着乡村振兴从“全面推进”向“全面振兴”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广度，更体现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即乡村振兴要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同步推进，实现乡村地区的全方位发展。在此背景下，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国探索与国际启示”为主题的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 2024 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2024 年会”）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至 26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会议由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主办，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会议期间，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 90 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就加快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现将与会专家和会议论文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挑战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实施方案，为“三农”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如期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正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历史性转移，从以脱贫攻坚为重心，转向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在内的乡村全面振兴。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多个方面。习近平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

【作者信息】李文静、颜廷武（通讯作者），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电子邮箱：yantw@mail.hzau.edu.cn。作者感谢与会专家学者的精彩分享，感谢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粹蔚、陈曙、郝壮、王玉泽、刘笑天、代喆、周晶、毛海欧、贺娟、张泽宇、金玲、施龙中、聂飞、郝晶辉等老师以及会场研究生秘书提供的会议纪要，文责自负。

国的头等大事”，并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①。进入新阶段，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任务。然而，从现实来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仍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粮食安全风险增加和农民富裕进程受阻等挑战，尤其在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农村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农民稳定增收等方面，亟待创新政策工具和构建有效应对方案。

（一）农业现代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1. 粮食安全与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中国农业现代化既受到新冠疫情发生、地缘政治矛盾、贸易保护主义等外部冲击，也面临着居民饮食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挑战。尽管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而复杂。

第一，全球粮食危机频发加剧中国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农业对外贸易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等挑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钟钰指出，21世纪以来出现了由全球粮食储备锐减（2007—2008年）、极端天气（2010—2011年）、新冠疫情（2020年）和俄乌冲突（2022年）引发的四次粮食危机，表明国际粮食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对此，在充分利用国际贸易调节国内市场余缺的同时，要确保必要的粮食自给率以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农业“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关键核心技术短板凸显，市场主体的国际经验和竞争力不足，农业对外贸易短期内仍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等风险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曹斌指出，农业“走出去”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资企业对外投资面临政府扶持机制、国际人才和核心技术实力相对不足等问题。因此，寻求中国农业对外合作的新方向、新渠道与新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市场基础，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二，中国粮食供需品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居民饮食结构的转型升级对粮食安全提出了新挑战。中国粮食供给的品种结构尚未顺应当下饮食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粮食供需品种之间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人均口粮消费减少背景下水稻、小麦产量相对过剩。虽然生产技术和设施优化使粮食作物产量连年增长，但居民口粮需求下降导致粮食库存进一步积压。2015—202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保持在0.65万亿千克以上，粮食库存高于17%~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②。二是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增加使得饲料粮需求呈刚性增长，但玉米、大豆等主要饲料粮仍存在较大的产需缺口。以玉米为例，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进口分项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进口玉米2713万吨，超进口配额1993万吨^③。当前，中国居民饮食需求已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在人均口粮消费减少的同时，高脂肪、高蛋白的动物性食品消费逐渐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2年中国居民人均粮食（原粮）消费量占食物总消费量的比重已从41.43%下降至34.46%，而肉类、禽类、水产、蛋类、奶类食品的合计消费量

^①参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5日01版。

^②资料来源：《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https://www.gov.cn/zhengce/202410/content_6980796.htm。

^③资料来源：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http://stats.customs.gov.cn/>。

的比重从17.58%上升至21.27%^①。新时期居民饮食更加追求营养结构的均衡性，这对国内粮食供给结构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2.农业生产面临内部压力和外部威胁。中国农业生产不仅面临人多、地少、水缺以及劳动力短缺的内部压力，也受到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外部威胁。如何有效缓解这些资源和环境约束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是与会者普遍关注的议题。

第一，中国农业生产面临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农情，人口压力不断加大，耕地质量保护任务日益紧迫，多元化食物需求引发新的供需矛盾。其一，中国水资源总量短缺，利用效率不高。华中农业大学李晓云指出，中国粮食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约束问题，具体表现是：农业用水效率不高，食物消费结构转变造成水资源用量日益上升，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及气候异常引致水资源供给日趋紧张。其二，耕地资源人均占有量少，耕地质量保护压力大。2023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6亩^②。传统的高化学品投入的粮食生产模式容易引发农业面源污染、耕地质量下降，耕地保护形势不容乐观。其三，人口压力持续增加，供需矛盾不断凸显。随着城镇化和农村老龄化程度加深，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且耕作农民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且人民群众“吃得好”的食物需求引发了新的资源紧缺问题。李晓云认为，当今社会食物消费结构快速变化，肉类消费增加，而水果、牛奶、水产品消费不足，导致对水资源的需求持续上升。

第二，气候变化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农业面源污染和工业外源性污染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其一，气候变化所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病虫害频发等严重威胁粮食供给，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引致全球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农业部门兼具碳源和碳汇的双重属性，推动种植业低碳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其二，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农用化学品的不合理使用和农业废弃物的不当处置易导致污染，危害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其三，工业外源性污染威胁加剧。农村地区生产要素价格较为低廉、环境规制较为宽松，不少工业企业将农村视为“污染避难所”，导致土壤污染，进而威胁粮食安全，并严重损害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华中农业大学张诗怡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城市站的三期建设方案作为准自然实验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引致城市地区污染企业进入减少、退出增加，导致农村地区承担了较高的环境风险。

（二）农村现代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1.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当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仍然突出，农民收入增长放缓，规模性返贫的潜在风险犹存，这不仅影响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抑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北京工商大学倪国华认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要推动高质量城镇化与经济结构转型“双轮同步”，创造有利条件支持农业劳动力从农业平稳地流向其他产业，又要合理引导资本和技术要素进入农业以缓解劳动力要素流出后的

^①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②资料来源：根据《2023年中国自然资源公报》（<https://m.mnr.gov.cn/gk/tzgg/202402/P020240229684355601875.pdf>）和《王萍萍：人口总量有所下降 人口高质量发展取得成效》（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401/t20240118_1946711.html）中耕地和人口数据计算所得。

生产力水平下降，确保农产品供给安全。中国农村地区的部分居民依然面临返贫风险：一是遭受疾病冲击或自然灾害冲击后容易返贫。华中农业大学甘海清指出，因病致贫返贫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致贫返贫原因，极易导致家庭掉入“健康贫困”陷阱。农村居民抗自然风险能力较弱，严重自然灾害容易给其带来严重损失继而出现因灾致贫的现象。二是行为主体能力缺失。例如，“易地扶贫搬迁户”“五保户”等特殊群体以及基本生活保障缺失的人群，往往表现出较弱的风险抵御力、恢复力和适应力，因而更容易发生返贫现象。三是市场发展机会较少。部分农村地区地理区位条件较差，交通运输和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限制了当地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发展。四是贫困治理机制的持续性不足。部分地区尚未建立有效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导致相对贫困治理难度加大。

2. 乡村发展潜力不足。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乡村治理体系较为薄弱、农村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多重因素叠加进一步制约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第一，农村劳动力流失现象日益严重，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凋敝化”现象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贾琦提出，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引发了学术界对农业未来的深刻思考。例如，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不仅导致农业生产的人力短缺，也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增加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的运行压力。第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区域不平衡现象，农村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服务水平有待提高。西南大学陈肖雄指出，农村公共服务落后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需要补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第三，农村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融合和绿色发展程度较低，产业结构调整面临资金、技术、人才等诸多要素的制约。此外，新质生产力作为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为特征的当代先进生产力，有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的活力，但需警惕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可能产生的鸿沟。例如，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可能面临技术获取难、应用成本高等问题，由此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

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探索

聚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国探索与国际启示”这一主题，针对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重点任务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求^①，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可行路径。

（一）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1. 以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业碳交易市场建设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第一，解决生产要素错配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量的关键着力点。生产要素错配是制约农业生产效率和产量提高的重要原因，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有效嵌入可促使要素资源重新配置，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东北农业大学白子明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可通过引导先进生产要素进入农业生产环节、通过专业分工实现生产方

^①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人民日报》2024年2月4日01版。

式变革、通过深化专业分工推动市场结构变动等方式带动农业绿色发展。

第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增强粮食生产韧性的重要途径。在稳定粮食产量和提升粮食生产韧性的双重目标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能有效提升粮食生产系统的稳定性。一是以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区域生产布局优化提高粮食系统生产韧性。贵州大学张青指出，农业社会化服务可通过规模效应和专业效应的发挥，促进粮食生产韧性的提升。二是以农田宜机化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江西财经大学龚璇指出，农田宜机化能够显著促进丘陵地区种植结构“趋粮化”，通过非农就业、社会化服务和土地转入等机制提高农户粮食种植比例，建议加强土地整治工作，促进农业生产环节外包。

第三，加快农业碳交易市场建设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有效方式。农业减排增汇的不确定性要求探索市场机制以推动农业碳市场发展。华中农业大学何可指出，农业碳交易建设面临着排放来源分散、核算方法“简单粗暴”、减排增汇效果不稳定等“先天条件”不足，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碳市场建设，能推动“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造林是增汇潜力最大的“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相较于工业部门的减排方式更有成本效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寒指出，中国造林增汇整体上具有成本有效性，且以再造林为主要形式的造林增汇有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但碳汇市场供给能力有待增强。

2.以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和农业技术创新促进农业高质高效。第一，以新质生产力和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发展农业产业中的新质生产力，既要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又要重视农业全要素的升级和重塑。成都理工大学罗浩轩提出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裂变”的两条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广泛运用智慧农业技术、生物育种技术以及重塑产业链等途径赋能农业；二是通过改革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以完善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条件。西北政法大学李隆玲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既可通过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降低碳排放强度等方式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也可通过减少资源错配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华中农业大学何可认为，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促使技术革命性突破、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增强农业碳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贵州大学任利刚指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农业净碳能力有积极影响，且在粮食主产区和农业产业集聚度高的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建议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潜能。

第二，以农业技术创新重塑农业产业价值链，促进农业高质高效。精准农业是实现优质、高产、低耗和环保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以畜牧业为例，精准畜牧业技术通过持续准确地监测畜禽生产、繁殖、健康和环境，从源头上确保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实现可持续养殖。东北农业大学崔力航发现，精准畜牧技术可通过降低劳动成本、减少兽医服务支出、减少产量和质量损失、提升整体生产力等途径实现技术效率的提升，且技术培训在这一过程中能起到积极作用。东北农业大学汤文洁指出，个体效率目标与所处制度环境价值判断一致能促使养殖户采纳动物福利型精准养殖技术，应重视建立精准农业技术示范项目，加强公益性技术培训，以推动养殖户的数字技术采纳和应用。

3.以耕地质量保护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业发展根基。第一，加强耕地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充分调动各类生产主体保护耕地的积

极性，提高耕地生产能力，是夯实粮食安全的重要根基。吉林大学任晓杰对东北黑土地的研究发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能促进黑土地转入户做出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保障粮食稳定生产。推广生态种养模式是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华中农业大学朱洋洋基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土地转入有助于农户采纳虾稻共作模式，且合理的土地流转政策和稳定的土地权益保护能够推动村庄产业深度融合，进而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第二，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支撑。积极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既能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推动农业生产实现绿色转型，也能提高农户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江西财经大学陈莉莉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能促进土地流转，且在粮食主产区、南方地区、种植结构“偏经济型”的地区作用更加明显。华中农业大学柳祺祺以秸秆持续还田为例，揭示了灌溉设施质量对农户决策的影响，并建议采取改善灌溉设施和提供农情支持等举措以缓解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4.以绿色农业政策支持和利益补偿机制创新强化农业发展保障。第一，对农业进行适度补贴是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正外部性的有效手段。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前提下，突出绿色生态导向，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宁夏大学刘澜指出，绿色补贴能有效促进养殖户向低碳生产转型，且对风险偏好程度高、养殖规模大的养殖户有更明显的促进效果，建议制定差异化的绿色补贴政策以促进养殖户向低碳生产转型。西南大学李丹认为，在粮食主产区，应重点加强高产高效品种的选育，发展现代农业技术，以保障粮食安全；而在非粮食主产区，应加大政策扶持和技术指导，鼓励农户多样化种植以增加收入并提升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

第二，健全利益补偿机制是缓解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粮食生产布局不均与消费需求多样的矛盾日益凸显，亟待构建有效应对方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迎基于国家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典型案例，提出协同合作模式、风险共担模式、价值互创模式、社会责任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五种利益补偿模式，并提出利益补偿机制的“需求—制度—机制—应用—自治”运行逻辑。

（二）促进乡村宜居宜业

1.以产业融合发展和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第一，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在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有助于农业产业链升级优化，让农民获得更多收益。中国农业大学任赞杰利用农业农村部“头雁”项目数据研究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的户籍类型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城镇户籍，负责人为农村户籍的新型经营主体，其经营绩效和联农带农水平更低。因此，进一步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应引导城市优秀人才流向农村，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农带农效应。

第二，发挥产业振兴带头人作用，通过利益联结、资源优化和公益带动等模式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华中农业大学林秋晓揭示了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的利益联结、资源优化和公益带动三种联农带农模式在提高农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乡风文明和实现精神富裕方面的积极作用。产业融合是促进欠发达地区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但其融合路径的选择应遵循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刘梦婷指出，产业融合萌芽期可实现初步延长产业链、减少资源消耗、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

产业融合形成期可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资源配置高效化、促进农户尤其是脱贫人口就业增收；产业融合成长期可通过多层次、多元化的产业融合模式实现产业绿色转型、农户就业增收，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

第三，通过财政支农和资产盘活等途径摆脱融资困境，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一是通过财政金融协同支农赋能农业绿色转型。山东农业大学朱鹏提出，可通过利用政策性农业担保，推动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重点增加农地整治流转、粮食生产加工、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融资供给；通过精准对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需求，避免资源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推动组织架构的网络化发展，提升农业主产区的融资担保服务供给，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奖补扶持力度。二是通过盘活农业生物资产拓展资金来源。有效盘活生物资产使其成为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物，对于缓解资金约束、释放乡村经济活力具有重要意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庄腾跃以消耗性、生产性生物资产为例，引入动态产量模型，对农业生物资产的抵押价值进行了动态评估，为生物资产价值提供了度量工具。

2.以党建引领与制度改革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第一，以农村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华中农业大学吴欢从村党组织书记领导力视角切入，发现村党组织书记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提供社会支持方面的工作能力提升、工作动机增强，能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展现更大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率。

第二，发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效应。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富裕的经济基础。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能通过合理开发与利用集体资产，形成硬件设施建设的资本积累，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能力，又能营造良好的乡村营商环境，改善农业生产的便捷性与生活居住的适宜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贾琦指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增加了农业专业户的数量，盘活集体资产和优化营商环境为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和更加优质的服务。

第三，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湖南农业大学徐进分析了资源开发、物业经营、资金入股、劳务经济四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其中，资源开发模式侧重于整合集体资源并吸引企业合作，物业经营模式依赖于资产出租，资金入股模式通过将资金投资企业获取股份分红，劳务经济模式则依靠服务创造就业。徐进指出，应通过提高农民参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入专业人才、强化集体经济管理、完善产权制度建设等措施，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3.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环境制度建设促进乡村生态宜居。第一，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促进乡村生态宜居的重要途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所面临的经济长足进步与公共事务衰败并存的“发展悖论”，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衰退。西南大学向栩揭示了劳动力流动对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影响：一是促使村庄的社会关联模式由“传统型”转变为“现代型”，使得农户社会网络得以强化，并通过社会网络的沟通功能和团结功能促进集体行动；二是增强以老人、儿童和妇女为主的留守成员对村庄社会网络的依赖，从而增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集体行动的意愿。

第二，扎实推进农村污染治理是促进乡村宜居的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以政府行政命令和绩效考核为主，并与市场化规制工具相结合。华中农业大学张诗怡指出，环境规制有效降低了城市

地区污染企业的生产规模，减少了污染排放，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但对农村地区污染企业的影响十分有限，因此，应推进县域空气质量监测站建设，加强农村地区环保工作的法规建设与资金投入，加快农村污染企业绿色转型，以缓解企业污染排放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

4.以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乡村共建共治共享与包容性增长。第一，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是提升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途径。中国农村面临着村容环境、农田水利等领域公共事物的治理危机，而将公共事物内部化可有效提升治理效率。通过加强数字素养培育、强化数字治理增效等方式，引导农户自发、自觉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激发村民“自治”的主体意识，有助于提高村民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以及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幸福感。宁夏大学罗静怡对四川省广汉市“川善治”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积分制实践案例的研究发现，数字化积分制能从技术赋能、价值共创和平台思维等方面赋能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智治”的能力，形成资源数据的互通共享，打造协商共治、利益共享的良好生态。

第二，以数字乡村建设带动产业发展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西南大学陈肖雄对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经验证据的研究发现，政务服务信息化可有效促进农村居民创业和非农就业，进而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华中农业大学黄雅姿发现，“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的实施对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农村电商发展通过在需求端拉动居民消费需求形成“倒逼”，在供给端促进非农产业集聚形成“助推”，在激励端加快资金流动速度形成“加速”，共同推动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福建农林大学陈臻鹏指出，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提升乡村创业活跃度和加快农业技术进步推动乡村包容性增长，但需警惕由此带来的马太效应和数字鸿沟等发展不平衡、不平等的问题。

（三）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以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防止脱贫地区农户规模性返贫。第一，有效控制和防范因病致贫与因病返贫。缓解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的健康贫困问题，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环节。华中农业大学甘海清揭示了社会资本对健康贫困的抑制作用，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缓解农户的健康贫困，主要通过丰富农户健康信息和提高农户健康认知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第二，充分发挥生计资本的防返贫效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姬明月基于中国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生计资本积累能有效降低农户返贫风险，通过资本组合和生计策略的调整可有效应对农户返贫问题。

2.以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高质量增收。第一，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新疆农业大学丁宁认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并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长期影响，但这种增收效应会随时间逐渐减弱。第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拓展农民收入来源，增强农民收入的稳定性。江南大学李小山指出，数字营商环境优化可通过促进农村产业数字化升级和农民非农转移来提升农民收入，且农民数字素养提高有助于强化数字营商环境优化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宁夏大学马梓涵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质量，且主要通过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发挥作用。

3.以农业食品制度创新和居民膳食结构升级促进农民高质量消费。第一，创新保质期标签用语体系，开展食物节约行动，减少食物浪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晓磊基于行为助推视角，揭示了保质期

标签新用语体系的作用，发现采用保质期标签新用语体系（此日期前售出、此日期前最佳、此日期前食用、此日期后变质等）可显著缓解保质期标签误读造成的食物浪费，且相较于食品安全类标签，食品质量类标签在缓解食物浪费方面的效果更优。第二，调整居民膳食习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转型升级。华中农业大学李晓云提出，引导农村居民向健康且“低耗水”的膳食模式转变，可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和居民健康。

4.以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富裕富足。第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是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韩家彬评估了“撤点并校”政策实施对城乡经济融合的影响，发现学校数量对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呈倒U型影响，即在学校数量适度减少的初期会促进城乡经济融合，但学校数量过度减少会阻碍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农民富裕富足的有效手段。安徽农业大学佟大建从城市户籍获取角度揭示了城镇化的共同富裕效应，发现农村户籍人口获取城镇户籍可以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缩小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会议期间，与会学者从归纳和总结国际经验的角度，围绕吸引外商投资与建设农产品大市场、推动国际合作伙伴贸易便利化等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国际经验

1.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和建设农产品大市场促进要素流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曹斌指出，日本非常重视外资企业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完善投资机制、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招商优惠等一系列优化措施破解外商投资进入壁垒：日本中央政府颁布了《未来投资战略2018》《对日直接投资促进战略2021》，日本地方政府出台了减免外资企业登记注册费用、补贴办公室租金和提供投资项目补助等优惠政策。曹斌指出，当前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走出去”的重要抓手，建立“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以提供国别投资合作指南、统计查询、安全风险防范等服务。湖南工商大学李东坡揭示了日本建设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的实践经验，包括：在小规模农业经营占主体的条件下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构建中央与地方、批发与零售密切结合的农产品市场体系，确立较为完备的立法体系，构建统一协调的市场运行规范、机制和组织体系，实施保障市场标准化的投融资项目，推广信息与通信技术，等等。

2.推动国际合作伙伴贸易便利化建设以共享发展机遇。中央财经大学于爱芝以中非贸易便利化实践为例，归纳了中非贸易便利化的实践经验：一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协助贸易合作伙伴开展交通、水利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产品多式联运新通道，打造全程定点运输线路，缩减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参与光纤、固定电话、互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息通信人才培养，通过建立电商平台和移动支付平台助力合作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中国企业与南非多所高校联合成立了信息通信技术学院，助力非洲构建本土的信息通信技术人才生态系统。二是优化合

作制度环境。通过加强双方在技术标准、检验检疫、商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助力贸易伙伴进行数字化贸易和无纸化通关系统建设，建立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降低交易成本，帮助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通过加强高层互访对话和建设政府间磋商与合作机制，开展战略对接，完善合作机制。

（二）对外合作实践启示

1.健全农业国际合作机制，构建全球农业发展共同体。以农产品贸易为抓手，积极推动与非洲等地区的农业经贸关系转型升级，有助于合作双方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中央财经大学于爱芝指出，中非农业贸易高度互补，具有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转变、助力非洲农业转型升级和保障非洲小农户生计的作用。其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能显著增强中非农产品贸易韧性。她建议，进一步完善对话机制，优化贸易制度环境，加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和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推进人才交流、促进技术创新合作与产学研合作。针对外贸风险较大、进口集中度较高的农产品，应积极拓展农产品进口来源，密切关注进口国制度环境和政策导向。河南农业大学赵明正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料增产潜力和合作前景较好，在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应积极推广种植经验和技術、分享优质品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以提升当地油料单产。对于中东欧地区，应关注当地农业开发政策，协助当地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依法依规投资，保护投资安全。

2.推进共商共建共享，强化乡村产业政策与技术支持。中国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在农业境外园区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为全球农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湖北工业大学吕潮浠以采取生物科技“走出去”模式的“老挝—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为例，对上市公司参与农业境外园区的风险进行了识别，提出应通过采取建立风险保障和风险应急机制、了解当地法律、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和增强企业自身财务能力等措施积极应对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曹斌指出，可通过加强对外投资的政策支持、提升投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引导新型农产品电商企业“走出去”等措施改善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环境。中国农业科学院张鑫蕊分析了中印农业开放合作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经济效应，发现中印在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各具比较优势，取消两国之间农产品贸易关税壁垒、降低技术性贸易壁垒，既能提高两国的GDP和非农就业率，又能改善生产结构和贸易规模，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资源和人才支撑。

3.创新国际合作模式，建立复合型农业人才培养体系。因地制宜地推进农业合作交流和技术推广项目，创新科技合作模式，并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合型农业人才培养体系，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西南大学邹宝玲认为，中国农业对外合作的成功实践包括：建设高水平国际合作制度；优化贸易结构和签订自贸协定；开展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和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建设；建成包括技术转移、来华培训、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等在内的农业科技对外合作体系；依托资金、技术、项目、人才等资源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因地制宜助力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和粮食安全水平。她认为，应寻求中国农业对外合作新方向与新路径：一是健全农业国际合作机制，构建新型农业对外伙伴关系与多边对话机制，保障农业合作的稳定与持续；

二是打造农业国际合作新优势，培育壮大跨国农业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三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创新发展合作模式，因地制宜地在不同区域实施农业合作交流与技术推广项目，寻求国际农业合作的利益契合点；四是全力攻克农业核心技术，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农业人才，创新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出海”的农业科技合作模式，并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合型农业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培育一批“懂技术、会经营、国际化”的新农科人才。

四、总结与展望

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从促进农业高质高效、推进乡村宜居宜业、实现农民富裕富足等方面提出了大量有益建议，并聚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经验与启示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次论坛中，专家学者就如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达成如下共识：第一，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契机，通过技术颠覆性变革、要素创新性配置、全链条减排增汇等途径推动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二，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信息服务和数字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第三，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基础上，想方设法促进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新时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务艰巨而意义重大，未来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包括：第一，探索引领农业绿色发展的创新型制度工具，构建区域性农业碳排放交易制度，完善“双碳”监测平台，深入挖掘碳交易框架下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实施路径，助力农业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协同推进。第二，探索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营体系，稳定农业社会化服务“产前”“产中”环节服务供给，拓展“产后”环节的服务供给，形成全链条、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网络，推动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第三，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聚焦智能农业、精准农业等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揭示其重塑农业价值链、实现农业高质高效的机制，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第四，探索健康营养均衡目标下居民膳食结构转型的驱动机制，通过健康营养标签干预等机制创新，引导居民向健康、低耗、可持续的膳食结构转变，推动农业供给与居民需求的良性互动，实现农业与健康的深度融合。第五，挖掘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增收致富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投融资创新模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强化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带动效应，确保乡村振兴成果惠及广大农民。第六，加强对国际经验的借鉴，立足中国国情探索创新型国际合作模式，构建便利化贸易制度环境和人才培养体系，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国际化视野和力量。学术界未来可围绕上述关键问题加强理论和实践讨论，为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和农民富裕富足提供科学依据和实施路径，切实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有效实现。

（责任编辑：胡 祎）